

学 习 中 共 党 史  
参 考 资 料

(二)

华 南 师 院 政 治 系 编 印  
中 共 党 史 教 研 组

4583号

#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一)

## 目 录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1927年8月7日) ..... (1)

中共湘赣边特委和红四军军委给湖南省委的报告  
(1928年7月4日) ..... (38)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政治议决案  
(1928年7月9日) ..... (41)

土地法 (1928年12月在井冈山) ..... (71)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1929年1月) ..... (74)

红军第四军军党部布告 (1929年) ..... (76)

土地法 (1929年4月在兴国县) ..... (79)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反对党内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  
主义反对派的决议 (1929年10月15日) ..... (82)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并批准江苏省委  
开除彭述之、汪泽楷、马玉夫、蔡振德四人  
决议案 (1929年11月15日) ..... (93)

中央第九十六号通告 (为坚决执行国际路线反对立三  
路线与调和主义号召全党)  
(1930年12月22日) ..... (99)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开除罗章龙中央委员及党籍的  
决议 (1931年1月27日) ..... (103)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革命政府为国民党反动政  
府出卖中华民族利益告全国民众书  
(1931年12月11日) ..... (108)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反对  
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三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  
共同抗日宣言 (1933年1月17日) ..... (112)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 (1934年1月) ..... (114)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  
委员会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1934年7月15日) ..... (119)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8日政治局会议通过) ..... (124)

中央第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  
务的决议 (1935年8月5日) ..... (145)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1935年12月  
25日中央政治局通过) ..... (159)

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 (1936年5月5日) ..... (181)

关于抗日救国的布告 (1936年6月1日) ..... (189)

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 (1936年8月25日) ..... (185)

中共中央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1936年9月1日) ..... (195)

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  
国的决议 (1936年9月17日) ..... (197)

- 张学良、杨虎城通电(1936年12月12日).....(204)
-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  
(1936年12月19日).....(205)
- 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  
(1936年12月19日).....(207)
- 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  
(1937年2月10日).....(210)
- 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  
——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  
战而斗争(1937年4月15日).....(212)
- 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  
(1937年3月31日).....(222)
- 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  
(1938年4月18日).....(227)
- 附：中共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党内  
报告大纲(1938年4月19日).....(228)

... 革命 ... 中国共产党 ...

# 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

中国共产党全体党员同志们，我们正处在极困难的时期，中国革命遇到了极严重的挫折。今年四月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如狼在武汉政府领域之内继续发展而完成。正在这以前，武汉政府曾经宣布蒋介石是革命叛徒，现在呢？它自己学了蒋介石的榜样反革命，如拿国民党之名，甚至于冒充左派国民党之名，来掩盖工农运动。在武汉领域之内与蒋介石之治下是一样的。他们所用的方法也是差不多的，农民协会被解散，被禁止，用百用千的玉鑫运动来指导同志被武汉政府的蒋派所残杀。农民运动所及的区域，无不受到反革命的清洗。所派暗杀工人亦是到处蔓延，他们借的武装被解除，他们的工会日益受着压迫或占领，他们的指导者亦被残杀。在武汉革命之中到处遇见军阀豪绅指派的走狗。压迫得尤其严重的，便是我们的党。十分之九的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从反动军阀一直到被革命所吓倒的小资产阶级。然而就在他们

... 同志们！ ... 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现在致书全体同志的时侯正是 ... 很困难危险的时期 ... 中国革命遇到了极严重的挫折 ... 今年四月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反革命政变，如狼在武汉政府领域之内继续发展而完成。正在这以前，武汉政府曾经宣布蒋介石是革命叛徒，现在呢？它自己学了蒋介石的榜样反革命，如拿国民党之名，甚至于冒充左派国民党之名，来掩盖工农运动。在武汉领域之内与蒋介石之治下是一样的。他们所用的方法也是差不多的，农民协会被解散，被禁止，用百用千的玉鑫运动来指导同志被武汉政府的蒋派所残杀。农民运动所及的区域，无不受到反革命的清洗。所派暗杀工人亦是到处蔓延，他们借的武装被解除，他们的工会日益受着压迫或占领，他们的指导者亦被残杀。在武汉革命之中到处遇见军阀豪绅指派的走狗。压迫得尤其严重的，便是我们的党。十分之九的反革命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共产党。从反动军阀一直到被革命所吓倒的小资产阶级。然而就在他们

不称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及蒋介石所领导的反革命的资产阶级，  
为人民之公敌，却称共产党为人民之公敌。国民党现在的领袖汪精卫等，  
早已背叛了国民党的主义及传统，接受军阀的命令而与共产党破裂。国民党驱逐军队中的共产党党员，  
我们的党不得不秘密起来，因为反动派要想完全消灭我们。反革命暂时的得着了胜利，正拿着武装来对付劳动阶级。如果现在所有的工会还没有捣毁净尽，如果工农运动的指导者还没有完全被杀，如果政府还在宣言保存工农团体，那末，这不过是因为反革命的军阀和国民党的领袖还没有完全集中团聚自己的力量。

我们要知道，如果群众运动不能够起来坚决的反抗，最近期间由他恐怖决不会减弱，只有越发厉害。我们对国民政府的尊重为工农决没有丝毫的幻想。这所谓国民政府是什么？它从革命的政权机关变成了资产阶级之反动的执行机关，变成了军阀的工具和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如汪精卫之类，跟着革命发展便堕落了，必定背叛国民党的主义，完全走进资产阶级的反动阵营。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对于资产阶级的反动派，现时还有些用处，因为革命运动的力量还没有完全镇压下去。资产阶级的反革命，利用国民党的这些叛徒，好暂时戴着孙中山先生的国民党招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大多数其美已经得脱了，出卖了革命的国民党之光荣的旗帜。一条路是汪精卫等，一条路是孙科等。孙科等太多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既已走到反动方面去，自然不是国民党的代表和领袖。所以一切工人农民都应当知道，最近期间的自

色恐怖或要奪取精忠振作的旗幟之節而實行，而且要大天承  
的房書起義，只有廣大的勞動群眾積極起來反抗給實行革命的  
的斗争，才能奪去篡衛國民黨旗幟以實行自色恐怖的叛徒之  
武器，然而叛區革命節，標示是不共容，刺劇不屈含不，對  
黨現在形勢是反革命派屬委不共群眾，其壓迫群眾運動以  
搗亂其團體，所以中央委員會首先要告訴你們的，便是你  
們是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從群眾運動里發展成  
了偉大的力量，在革命斗争的時期，它的作用是不可磨滅的，  
現在我們黨的作用更加要大，我們對共產國際決議，試此的人  
而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對中國問題的歷次決議，是黨的  
政策及黨的指導有非常重大的意義，過去中國革命的進程，  
大半與本黨政策有關係的，不將來革命的命運在形勢變更之  
后，更加要靠我們黨的政策正確，要看我們黨對形勢變更  
之后的職務之履行如何而定，我們對共產國際決議，一面要  
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最近決議指出，我們黨的指導犯  
了極大的機會主義的錯誤，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要強迫積極  
的自己批評這些錯誤而糾正它們，這些錯誤並不是指各個的  
偶然的錯誤而說的，而是說黨的指導，換言之，極深機會主義  
的錯誤方針，如果不拋棄這一機會主義的方針，糾正過去的  
錯誤，那就不能正確的規定将来的工作，共產黨更不能進行革  
命的斗争，以適應当前的艰巨職任，要糾正錯誤的方針，必  
須指明是怎样錯誤的，應當要使每個黨員都得着過去黨的教  
訓，我們黨如果不糾正指導機關的錯誤，那就一步也不能向  
革命的道路前進，工人階級的革命黨，要糾正自己的錯誤，  
要有公开的批評這些錯誤，而且要使全黨黨員都參加這種批

浮。无产阶级的政党不怕公开地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共产党主义者不能无所畏惧地所忌惮的批评党的错误、疏忽和缺点，那麽，共产党也就完了。我们的党公开承认并纠正错误，不含混不隐瞒，这并不是示弱，而正是证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我们深信本党的生命与力量决不致于怕披露和批评我们的疏忽和缺点，甚至于披露之于我们阶级仇敌之前退无所怕。等共产党的敌人幸灾乐祸好了！让他们去乱叫共产党崩坏了！这种攻击，是吓不了我们的，我们战胜敌人的地方，正在于我们是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之先锋队，能够在自己的错误经验里学出来，绝无畏惧披露自己的错误，并且有力量来坚决的纠正。共产党非有这种力量不可。我们党有这种伟大的力量，不但因为我们党的阶级性使然，而且因为有着群众的奋斗，无产阶级及贫苦农民群众之奋斗做保证——这些群众是我们党的基础。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决议上说：“中国共产党英勇的奋斗，中国共产党广大的党员群众，艰苦牺牲的在社会下层工农城市贫民之中，实行真正革命的奋斗”。我们的指导机关却有机会主义的错误，经常的动摇和犹疑，在紧急关头总是没有坚决行动的決心。本指导机关的非共产主义的不革命的理論以及不革命的倾向，不但绝对的与共产国际的决议和指示相矛盾，并且和我们党员群众工作相反。上海、广东、湖南本党普通党员群众都有过伟大的奋斗，屡次光荣的总同盟罢工，上海三次工人暴动，——最后今年三月的一次得着了胜利，这些都是光荣的历史，不但在中国史上有无比的荣誉，而且，在世界革命运动史上也是



如此。这一页光荣的无产阶级所写的。

上海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性、革命性、阶级意识的坚决和政治意识的高度，甚至欧洲各国无产阶级所不能超越的——那些国里的工人革命运动，差不多都有了几十百年的历史呢。中国共产党可以以上海的共产党群众自豪了。上海工人在蒋介石屠杀之后，虽然随着闻所未闻的压迫，许多最好的指导者（如陈延年、赵世炎及其他同志）被杀，一切运动都压迫到非常秘密的地位，然而仍继续着斗争，表现不可摧残的伟大力量。广东的共产党员，领导了铁路工人的暴动以反抗李济察长领导农民运动的武装暴动能够在各地方继续抗争至两月之久，真正象勇敢坚决牺牲的革命党人，奋斗到最后一滴一点的可能，这些共产党员真正可以做革命形势中工人阶级的先锋的榜样。湖南同志领导农民运动的斗争，亦是这样光荣的中国历史里的一页，农民协会的实际的政权，是共产党员领导而农民群众所创造的，自动没收大地主土地，分配土地于乡村农民，解除反动团防的武装，创立武装的农民军，严厉的镇压封建的反动分子，极伟大的农民运动的规模，而且会和国民党下级群众结合革命的联盟，而不是机会主义的联盟，最后组织农民暴动以反抗长沙的反动政权。（这次暴动如果不是中央党部机关在紧急关头采取可耻的退让政策，无疑的是胜利的。）这都是湖南共产党员努力的战绩。这是解决土地问题最好的方法。其他各省的共产党员群众，亦是如此。党鼓群众的行动，真正是英勇彻底的革命斗争，这种斗争要忍受很大

的牺牲，但是我们党的群众没有怕牺牲的。中国革命之中，他们的奋斗，使得我们的党取得伟大的光荣和信用。党的群众是我们力量之源泉。有他们的帮助，党的指导机关之错误，无论如何大，都是容易纠正的。固然，指导机关的机会主义，动摇犹豫，没有坚决实行的能力，这对于中国民众的革命斗争和共产主义的运动大有损失。然而本党有上海、广东、湖南的经验，决不会因指导机关之错误而陷于败亡。本党一定有这个力量，保证今后有正确的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指导。

### 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

党的指导有机会主义的错误，其基础在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不了解各种阶级在每一革命阶段里的作用，以及共产党的作用。正确些说，是对于这些问题没有布尔塞维克的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党的指导每当解决这些革命之根本问题的时候，时常在理论上实践上违背共产国际的根本原则及列宁主义对于中国革命的估量，中国共产党中委员会在这些根本问题上陷于最庸俗的机会主义。

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的民权革命，而有生长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趋势。中国革命尚在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阶段。它反对帝国主义之压迫及封建制度之一切社会经济政治的遗毒。现在中国革命的根本内容是土地革命，是工人阶级要求解除闻所未闻的压迫制度与奴隶制度之斗争。这种奴隶制度，正是帝国主义依据中国封建关系以建立其统治之基

础。

如果以反帝国主义的国民革命与阶级斗争及社会革命相对立，那末，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简直不是布尔塞维克的。共产国际向来反对这一般的观点，认为是最好的一种机会主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决议案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坚决的反对以国民革命的职任与阶级斗争的职任相对应的观点。这一类的观点在西欧各国的极左派与社会民主派之中都有的。其实这是抛弃中国国民革命中无产阶级之领导权，抛弃领导权而争所谓‘劳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是机会主义之一种，实际上便使无产阶级变成‘民主营垒’的尾巴。”中国革命中各种社会阶级的作用是怎样的呢？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压迫，极大一部分是依据中国经济的落后，依据于农村中的封建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及政治制度中的封建制度遗毒，是外国资本无限制剥削中国民众之最好的依据。帝国主义维持着地主豪绅及封建式的行政机关。封建阶级维持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统治。所以非常之明显的是，反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同时就以全量反对地主豪绅的政权。封建制度的破坏，就是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上严重的致命的打击。而要破坏这一封建制度，又只有用剧烈的土地革命，愈坚决愈剧烈，农民群众加入斗争的愈多，赶走地主豪绅的统治愈厉害，农民运动规模的愈广大，国民运动的胜利愈巩固。

从另一方面观察，外国资本在经济上勾结一部分城市资产阶级（买办），这一部分资产阶级，利用帝国主义对中国

的压迫保存而扩大。

至于所谓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呢？那么，他们是受外国资本的竞争而又受其排挤的一部分中国资本。因此，他们被逼而不得不对于帝国主义实行经济斗争。

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曾经参加中国的革命，甚至有一时期曾经做这一运动的领袖，然而迅速发展的工人阶级及农民群众运动，提出革命的阶级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又大大的发展，这些情形，使民族资产阶级离开国民革命的战线而走入反革命的营垒。民族资产阶级这种政策上的变节，以蒋介石在上海的屠杀而著名。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今年四月间，饱受革命运动伟大的规模之恐吓，就要去和帝国主义妥协，他如今和买办阶级，封建阶级的大地主相象，将要成为外国资本对于中国统治之支柱。正因为这种情形，更使无产阶级的斗争，为力争自己真正的阶级要求的斗争，变成民族解放革命所必须的条件。

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使它与帝国主义接触而引起最坚决的冲突，中国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足以割断帝国主义力量之根源。中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程度之低，真是闻所未闻，这种情形，保证了外国资本在中国取得了最高的利润，反对中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正可以割断帝国主义压迫所依据的支柱；中国工人阶级则因客观状况的关系，是力争中国民族解放最坚决，最彻底，永不妥协的阶级，此种情形，使中国无产阶级取得民族解放运动中之领导权。可是中国无产阶级要履行自己解放中国民族的使命，只有随着力争自己的阶级要求的斗争的发展，就是反对外国资本在中

国资产阶级斗争的开展，而日益实现这个使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决议案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承认中国的民族解放革命（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已经‘完了’，仿佛在上海屠杀之后，已经开始了另一种工农的阶级革命——这是不对的。”中国革命现时的危机及各种社会阶级力量离合现势，表明并且证明，反对封建制度的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之完成（土地革命亦在其内）——尤其是反帝国主义斗争的完成，必须实现于反对已成反革命的资产阶级之斗争之中。彻底的民族解放斗争，不但不会和工农群众的斗争开展或土地革命的要求相冲突，而且能直接发展广大的下层民众的群众运动。

谁要民族解放革命得到胜利，谁要中国完全脱离外国的压迫，他便应当促进、扩大并激励工人反对资产阶级，农民反对地主的阶级斗争，他便应当赞助社会斗争，使之置于全体平民革命之新方式。

至于小资产阶级，则除去少数的反动的成分，与反动阶级、封建阶级相勾结的成分，其余一般手工业者、输入、半工半农、店员及城市贫民，亦因自己客观状况的关系都利于革命的阶级运动之胜利。然而小资产阶级必然是动摇、犹豫徘徊于互相斗争的阶级及革命反革命之间。这种犹豫与动摇，在相对革命斗争的出路，有举足轻重的力量。

但是小资产阶级动摇犹豫的态度，大部分由于革命阶级运动的力量决定的。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斗争越坚决，愈激烈，农民反对地主的斗争愈深入，则小资产阶级愈能转向左倾，愈能站到革命的战线上来，反之，如革命的阶级及资产

党自己也表现动摇，不彻底，不坚定，则小资产阶级愈加倾向资产阶级的营垒，反革命的营垒。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除自己的坚定与果决外，没有更真实的领导小资产阶级的方法。

列宁屡次的说过：“谁要帮助动摇犹豫的人，必先自己开始便应当不动摇不犹豫”。我们是应当记着：社会之中既然发生了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斗争，小资产阶级便无论如何不能有自己的独立的策略；他或者和资产阶级同道，或者和无产阶级同道。无产阶级应当明了小资产阶级之动摇是不可避免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他自己应当有坚决的政策，去以革命的方法解决目前的问题。

凡此一切，都是对于中国革命中各种动力的估量，足以决定共产党的革命策略的。然而我们党的指导，在理论上，尤其是在实际上，刚刚对于中国革命中各阶级的力量的估量，有一个相反的观点。这就预定党的指导之机会主义动摇犹豫政策。中央完全是孟塞维克派似的，将民族解放运动与阶级斗争相对立，仿佛认为阶级斗争的开展，足以破坏国民革命，而要想叫全党及工人阶级农民都自己来限制阶级的要求，对于中国的资产阶级及地主不用革命的斗争方法。仲来在六月十九日所发给上海的信，对于上海斗争的指令说：“中国革命主要特性之一，是反帝国主义……现在几乎忽略反帝工作”仿佛专注于消灭封建制度，而得到不好的结果。中央对共产党员走得太远了，更叫本党所领导的革命的农民往后退。这一指令里又说：“一方面反帝国主义运动消沉下去，别方面工农运动发展到最高限度，至少小资产阶级

看来是如此。单调的去武装工农没收土地，高叫非资本主义前途等口号，使小资产阶级怀疑共产党快要革国民党的命，要进行阶级革命而不是国民革命”。这样中央那时认为阶级斗争是一事，国民革命又是一事。这一信涯又说：“小资产阶级看不见没收土地是国民革命的必要前提，以为只有共产党要没收土地，实行十月革命似的革命，以增加工农的功量，因此小资产阶级不能不提出这种问题，不能不要求限制工农运动，甚至于与共产党破裂。在这种情形之下，能不能完全接受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呢？如果这样，那就是取消我们的力量，抛弃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投降蒋介石，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前途。然而能否硬要没收土地武装工农呢？这个结果就要立刻破裂而消灭革命的根据地。如果我们不能用相当的方法渡过这种难关，那就是资产阶级胜利。我们应不应该抛弃没收土地武装工农的政策呢？这当然不好。譬如湖南反许的问题，我们已经决定领导农民自动的没收土地，武装起来，这是独立的政策。但这种政策太危险了，假使我们完全独立的干起来，那末，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将要破裂。固然这是光荣的失败，但是破裂对于我们是不利的，我们应当找新的道路。经过新的道路来渡过现在所遇的危机与困难，使革命深入广出，而得到最后的胜利”。这指令的结论是：中央叫上海的党部“不要看着国民革命运动是工人问题”，而要到各阶级中去宣传反帝国主义，这是说去宣传上海资产阶级。这真是闻所未闻的不革命的非共产主义的方针，是见中央指导机关对于革命的根本问题，对于中国民族解放革命的性质问题的见解都是错误的。

中央在这问题上的机会主义是共产主义者受资产阶级影响的反映，整个儿的革命策略，都是本末倒置，中央的这种方针，完全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及决议不符，完全与劳苦群众工人阶级及革命的农民之斗争不符。

谁要替这个机会主义者辩论，或者主张继续这种机会主义，他便永久和共产主义告别了。

### 三 中国共产党与工人运动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就是无产阶级最先进、最革命、阶级觉悟最高的一部分。共产党的工作应当永远从工人阶级根本利益出发，要求以革命的方法，变更全社会的组织。共产党既以工人阶级利益为最重要的前提，同时，再提出资产阶级民权革命的时期中客观上可以解决的要求。在这一革命还没有达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轨道上的时期中，都是如此。共产党主要任务之一，便是组织工人群众而指导他们的斗争，坚决的力争增高生活程度，增加工资，实行八小时工作制，争得绝无束缚的工人组织及阶级的工会之完全自由，争得无所限制的罢工权，努力反抗以及消灭工人无权无利的奴才状况。

这种要求，工人都可以在民权革命中提出，但是必须用无产阶级群众的独立斗争。共产党应当发展、扩大并激励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应当领导工人每次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共产国际屡次命令中国共产党，要我们尽力量增进工人阶级群众的物质生活，坚决的要求改良工厂生活，提高工人



的社会生活，激急的取消一切压迫工人的法律，要求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认识自己组织工会及罢工之权利，同时共产国际指示必须迅速勇敢坚决的实行武装工人和农民，尤其是其中最觉悟最有组织的分子。这一政策国际是认为万分必要的，共产国际的这种指示和各地工业区工人群众自己斗争是相符的，和本党党员群众的行动亦是相符合的。然而本党指导机关却是走的别条路，它只在阻止缓和阶级斗争和工人的革命行动，中央不去开展推动罢工运动，却同着国民党领袖规定强制的仲裁办法，而且最终决定主权属于政府。在各地的指导者，假使说共产党还没有完全失掉自己独立的无产阶级的面貌，则是因它的下层组织与党的群众的功劳。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方面，可算尽可能的做到了与国民党“右派”指导完全同化的工作。

在大多数省份中的共产党员，他们的革命工作真正在国民党中达到领导的影响，而中央却反对这些组织。在中央五月通过的关于国民党联席会议的议决案（国民党工作大纲）上说：“共产党在联席会议应讨论各种主要的问题，提出具体的建议，但是这些具体的建议不应根据我们党的最大要求，而应注意到民族革命发展的利益与团结国民党的左派”。从这个中央决议中，可以得到的结论是：一，“共产党的最大要求”与民众运动的利益是不一样的，这是两不相容，互相冲突的两方面；二，共产党的“具体建议”不当建筑在党的“最大要求”，就是说在现在革命阶段上不适用共产党的政纲、策略与一般的政治路线；三，民族革命运动与国民党“左派”，只有在共产党放弃自己“最大要求”